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克文日記 1937-1952

上冊



陳方正 編輯·校訂

陳克文日記

1937-1952

上冊

陳方正 編輯·校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克文日記 (1937-1952)

· 上冊 ·

著 者 / 陳克文

編輯校訂 / 陳方正

出 版 者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

電話：(02)2782-4166

劃撥帳號 / 1034172-5

戶 名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訂 購 處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印 刷 /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16 號 8 樓

電話：(02) 8227-8766

初 版 /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定 價 / 新台幣 1200 元 (上下冊一套)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78-986-03-4730-2

GPN 1010102846

余 序

陳克文先生是我的朋友方正兄的尊人。記得大概在兩年以前，方正兄告訴我，他正在開始整理克文先生的日記。我聽了非常興奮，鼓勵他趕快完成這一重大計劃，為中國現代史增添一種最可信的史料。二〇一〇年三月起，方正兄編校的《陳克文日記輯錄》的第一輯（一九三七年）開始在《萬象》雜誌上連載（第十二卷第三期至第八期，又第十期至第十一期），我每期必讀，而且越讀便越感覺我的最初期待得到了十足的印證。這部日記為什麼具有這樣高的史料價值呢？方正兄下面一段話充分地解答了這個問題：

父親歷任行政院參事、立法委員，和短暫的立法院秘書長，地位並不高，但長期負責實務，得以從內部和中層來觀察政府運作和眾多政壇人物言行；而且他剛出校門就入黨、從政，與政界乃至學界有廣泛接觸和交往，他的觀察、評論應該還是很有興味和歷史價值的。（《陳克文日記輯錄》「前言」，《萬象》第十二卷第三期，二〇一〇年三月，頁一）

這部日記共分七輯，再加上最後一章（尾聲）；我已讀過其半：除已刊印的第一輯外，我又細讀了第五、六、七輯的稿本。讀後的整體印象完全符合上引方正兄關於日記的簡要介紹。但是我還要增加一重理由，以凸顯這部日記的特殊史料價值。正因為克文先生一直擔任著中央政府最高行政或立法機構的高級事務官，所以他上可以隨時與中央首長（如行政院長和立法院長）直接溝通，中可以經常與同僚交

換意見，下則可以通過低級部屬而認識到整個科層系統的運作。我曾讀過王世杰先生的日記，他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自然高於克文先生，但也因此之故，所見偏於最高層的小圈子之中，視野反而受到較大的限制。

我對於這部日記特別信任則是和我對日記作者的信任分不開的。但這並不是因為我和方正兄之間的友誼關係，事實上，我耳聞克文先生的大名遠在認識方正兄之前。一九五〇至五五年，我就讀於新亞書院和研究所時期，已開始接觸香港的文化圈子。當時克文先生是這個圈子裡面很受尊重的一位長者；他不但時時發表政論文字，而且還在五十年代中期主編著名的《自由人》周刊。我雖然無緣拜謁克文先生，但從師友前輩等處聽到的風評，即早已心儀其人。讀過大半部日記之後，對他持論之公允和辦事之認真，我更獲得了親切的認識。

正是由於公允和認真兩種長處，克文先生主持的《自由人》很快便取得了輿論界的牛耳地位。讓我舉兩個例子來加以說明。一九五五年八月《自由人》四六四期刊出了兩篇文章，攻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把持學術資料」，不許外人借閱。胡適在美國讀了這一期，認為這種指責有損史語所的名譽，因此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中研院院長朱家驊，要他趕快設法補救（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頁二四八八）。第二個例子也出於胡適。一九五六年一月《自由人》第五一期和五二期載有徐道鄰〈記丁在君〉一文，胡適讀後認為其中有幾處嚴重的記憶錯誤，因此在二月一日寫了一封給《自由人》「編輯先生」的信，一一作了更正（見同上，頁二五一三—二五一四）。不用說，這位「編輯先生」當然非克文先生莫屬了。我想這兩個例子充分證實了《自由人》在當時港、臺和海外文化界巨大的影響力。

我又無意間在吳宓的日記裡發現了克文先生辦事認真的一則紀事。一九四六年八月下旬，吳宓在重慶尋找飛機座位去武漢大學任教，幾處有關機構都不能給他任何確定的答覆。最後有人極力主張，他應該「往謁行政院參事陳克文」。於是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下午，他在行政院辦事處見到了克文先生。日記中寫道：

陳〔克文〕立命莫(按：科長莫子純)辦乘機申請表，核准宓乘中國航空公司班機，于八月三十日(星期五)飛漢〔口〕云云。陳出示二公函，知此事已交代與交【通】部項參事。陳對宓乃以友誼特助云云。宓謝出。(見《吳宓日記》，北京：三聯，一九九九年，第十冊，頁一一五)

克文先生和吳宓素不相識，竟在星期六下午一二小時之內爲他辦好班機座位，效率之高已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

爲了這件事，我特別查證了克文先生同一天的日記，可惜沒有留下紀錄，但在前兩天，即八月二十二日，我讀到下面一段敘事：

下午四時出席中央黨政軍各機關代表五十餘人聯名柬請，在勝利大廈舉行的慰勞茶話會。他們於會席上說了不少對我個人獎飾慰勞的話，並且很鄭重的送給我一本各代表親自簽名的紀念冊，冊裡開首一頁題著「平允周至，任勞任怨」兩句話，跟著一篇單簡的敘文，述說我從去年九月到現在，辦理復員運輸的工作經過。他們把復員運輸送走了卅萬人的成績算作我的功勞，實在使我慚愧萬分。

由此可知克文先生自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起，便全力承擔著復員中央各機構的繁重工作，一年之內竟安排了三十萬人從重慶回南京的旅

程。明白了這一背景，他在片刻之間為吳宓解決了機位的問題便不足驚詫了。前面我已指出他具有「持論公允」和「辦事認真」兩大特長，現在看到「平允周至，任勞任怨」八個大字，我覺得這確是對於這位高級事務官的一個最準確的評價。

基於對克文先生人格的認識，我讀他的日記，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種信任感；無論是記事或是評論，我反覆參究，都覺得是可信的。可信度是和日記的史料價值成正比的。有些日記雖然是重要原料，但由於其中存在著諱飾、曲解、偏見、謊言等等缺點，我們引用時不免要小心翼翼，甚至必須先作一番考辨的功夫。近十餘年來，我讀了大量的日記，從清代一直到二十世紀，不是為了專業研究，而是為了從種種私生活的角度去認識歷史的變動；這一角度不但與所謂「正史」不同，而且也與專史或地方史大有分歧。在這一長期閱讀過程中，我發現日記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基本上可以信任的，另一類是未可盡信的；前者可以《吳宓日記》（正、續兩部共二十冊）、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十冊）為代表，後者則以《鄭孝胥日記》（五冊）、《周佛海日記》（兩冊）最有典型性。克文先生的日記便屬於前一類，而且是其中的上乘作品。

最後，我要對《陳克文日記》的史料性質略作說明。《日記》始於一九三七，即抗日戰爭開始的一年；終於一九五〇，即國民黨完全撤離大陸的一年。因此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這部日記是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上從「衰」到「亡」的一個相當客觀的提綱。一般的看法以為國民黨的衰落始於抗戰後期，事實上，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以後，由於「八一三」上海戰爭的最後失敗，不少中上層的官員對於國民黨領導抗日的的能力已發生動搖。《陳克文日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條記載：

戰敗後，許多人的自信心似乎漸次消失。張伯勉到四明銀行接洽公務，便說政府改組，最好請毛澤東做行政院長，朱德做軍政部長，他們的辦法要多些。彥遠、介松在旁邊，也附和此說。這分明是自信心已經動搖了，戰敗不足怕，自信心動搖了，才是真正可怕。

張伯勉名銳，當時是行政院參事，他對毛、朱及其黨未必有任何認識，竟發出這樣的議論，並且得到其他同事的附和，可見國民黨在精神上已開始潰散了。《日記》同年同月十七日又記下了羅君強如下的議論：

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組織，多般利害，影響必定不少，如今我們可以隨意選擇我們的去處，那一處待遇好，我們便到那一處，橫豎都是中國人的統治，又何必分彼此呢。

克文先生接著說：

這段話似乎是說笑，又似乎不是說笑，介松、彥遠聽了都很生氣。我最擔慮的倒不是君強個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許多人會如此動搖起來。

這又是自信心動搖的另一表現。羅君強說的不是笑話，而是真實的想法，所以第二年便追隨周佛海到日本佔領下的上海去了。如果我們一讀周佛海在同一時間內的日記，則更可見國民黨內部已因抗戰失利而深陷在悲觀的氣氛之中。（參看《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上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及十二月三日兩條）許多中堅的幹部失去信心顯然標誌著國民黨衰落的開始。

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上滅亡的過程，集中在一九四七一四九那三年之中，這也在《日記》中有清楚的跡象可尋。我為什麼把這一過程的展開放在一九四七年呢？這是因為《日記》在這一年的元月和二月各記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元月二十五日條：

下午到李正偏寓，貢華、介松、宜山、予遂諸兄均在座。談到最近數日國軍在魯敗績，他們都一致認為國民黨再無法和共產黨打了。

這些人大概都是克文先生的行政院同事，他們對於山東戰事失利的心理反應和上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一三」失敗的情形先後如出一轍。軍事逆轉是政權崩潰前的一個確實的信號，毛澤東的〈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便是在一九四七年寫的。同年二月十五日，《日記》保存了王寵惠關於時局的一些意見：

他說：「以前聽到許多外國朋友批評政府貪污無能，以為是過火的話，現在耳聞目擊，確是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無不腐敗，無不貪污。」又說：「在重慶時即預料戰後國民黨必不免與共產黨齟齬鬥爭，卻不料有今日這樣厲害，更不料戰後的經濟災難會有今日這樣，比戰爭期間更為嚴重十倍百倍的情形。」對於經濟災難，他再三慨嘆說：「現在真是活不下去了。」

政治腐敗和經濟災難一時併發，以致連王寵惠這樣的中央大員都發出「真是活不下去了」的慨嘆，則政權之搖搖欲墜，可以想見。把這兩條日記放在一起作觀察，一九四七年在國民黨南京政權衰亡史上的特殊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從一九四七到一九四九，國民黨內部分崩離析而終至全面潰亡，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陳克文日記》對這一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都留下了或詳或略的記述和觀察，但可惜我已不能在此作進一步的討論了。

我在前面指出，這部《日記》可以看作是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上衰亡史的一個客觀的提綱。現在讓我再對「客觀」兩字的涵義稍加澄清，以結束此序。正如方正兄在上引〈前言〉中所指出的，克文先生在黨內屬於汪精衛的系統。在《日記》（一九三七—三八）中我們也看到，他很得汪的信任；例如汪和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交換關於與日本謀和問題的意見，克文先生即是少數在場人證之一（見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條），又如汪與蔣介石兩人私下討論時局的綱要，他也得到單獨閱讀的機會，《日記》云：「臨別，（汪）先生誠云，余與蔣先生所討論者，慎勿告人。」（見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條）這一親密關係一直維持到汪在一九三八年底發表「艷電」為止。而且克文先生公私分明，勝利以後仍對陳璧君和汪氏子女表現出真摯的關懷。（見《日記》一九四七年元月七日、十九日和三月九日三條）

另一方面，由於《日記》作者是廣西人，李宗仁的桂系也一直在拉攏他，而李競選副總統時，他也曾為之「奔走選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條）。一九四九年李任代總統期間，他對李的民主風度是很欣賞的。三月十六日的《日記》，說：

談話會的進行異常和諧，發言異常坦率，大家吸烟吃茶，也異常隨便無拘無束。代總統傾耳靜聽，說話極為客氣。做結論的時候，亦極合民主原則，絕無專斷命令的神氣。使人想起從前當著蔣總統面前那種嚴肅拘束的空氣，說話願忌保留

的場合，真是兩種極不相容的作風。

正因如此，克文先生和國民黨中的自由分子曾一度希望另組政團，擁戴李為領袖，以造成一個民主自由的反共新勢力。（見《日記》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和十一月九日兩條）

像這樣一位與汪系和桂系都有關聯的人，我們通常大概會假定他在私人日記中對於蔣介石及其嫡系一定抱有很深的成見，筆下也必多斥責之辭。但這樣的假定用在《陳克文日記》的個案上卻恰恰適得其反。克文先生非常不滿蔣介石的專斷和集權，這是毫無問題的。然而對於蔣作為國民黨的最高領袖，他始終不改其尊重的態度，並且時時表現出一種同情的理解。抗戰爆發後，他雖體諒汪精衛的謀和苦心，但民族的尊嚴感卻使他成為蔣介石堅持抵抗的積極擁護者。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他聽了蔣的國慶廣播詞後，記道：

詞意聲音，均不失為全民族艱難苦鬥中最高領袖之表現，室中人均肅靜傾聽。最後蔣委員長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者三，室中人亦不禁隨聲高呼，並繼之以「蔣委員長萬歲」也。（參看《日記》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條）

一九四七以後蔣的政權已進入最後崩解的階段，克文先生在日記中對他仍然時時流露出一種維護的情意，決沒有半分譏笑或呵斥的意味。一九四七年三月蔣在三中全會總理紀念周上作了一次「極沉痛的演說」，有人認為蔣是「獨裁或隨意罵人」，但克文先生則說：「其實如沒有他這樣的領導，國民黨真不免要分裂或沒落的」（見《日記》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條）。甚至在下野前幾天，蔣還在新年團拜時說大話，強調「只要我們恢復自信心，一定可以轉敗為勝」。聽者自

然不免暗笑，克文先生當然也不會相信這種誇張之言。但是他的觀察角度與一般人不同，他說：「不過在我看來，他是確有信心的。看他今天的精神十分健旺，絕無悲觀頹喪的樣子，不失為一個造時勢的英雄。」（《日記》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條）克文先生把問題從客觀的形勢轉移到蔣個人的主觀狀態，他的觀察還是經得起考驗的。

總結一句，作為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上的一部衰亡史提綱，《陳克文日記》的歷史客觀性具有最可靠的保證。保證何在？在於作者徹底地跳出了黨派意識的牢籠。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余英時' (Yu Yingtim) in a cursive style.

二〇一二年一月八日於普林斯頓

編者序

先父克文先生（1898-1986）辭世已經足足四分之一世紀。他留下了十二冊日記，載 1937-1952 十五年間事，主要是八年抗戰和國共戰爭期間他在國民政府的見聞，特別是國府兩度撤離南京的始末。這些六十年前舊事已成滄桑，所牽涉人物絕大部份也都物故，相信現在是將日記公之於世的適當時候了。父親在 1925 年加入國民黨，經歷北伐、農民運動、寧漢分裂等重大事件，1935 年加入國民政府，歷任行政院參事、立法委員，和短暫的立法院秘書長。他地位不高，但交誼甚廣，又長期負責實際政務，得以從內部和中層觀察政府運作以及政壇人物的言行，更與不少學界、文化界人物相熟，因此日記中對那十餘年間驚心動魄事件的記載和評論，是很有歷史價值和興味的。

然而，父親雖然以謙和、忠厚、謹慎自持，亦以此知名，卻絕非庸碌無為，缺乏主見之輩。他有政治抱負，胸中更有是非智愚賢不肖的尺度，因此在日記這樣的私人空間抒發感慨，月旦人物（包括至親好友），是十分坦白、直率甚至尖銳的。如今當事人雖然已經辭世，但他們後代子孫見到某些片段，也還可能受傷害。因此我對發表日記曾經頗感躊躇，權衡再三之後，方才決定出版。這主要是意識到保持歷史真實及其豐富、多元面貌之重要，以及相信六十年前想法如今已成明日黃花，再沒有現實意義，而只是歷史的一部份了。無論如何，日記中的評論並非經過深思熟慮，而只是當時私底下自然流露的反應、感想，因此偏頗、過激、不成熟、前後不一之處在所難免，不應該視

爲定評。這點相信克文先生在生，也是會頷首的，讀者鑒之。

克文先生於一八九八年出生於廣西岑溪縣一個頗有新思想的自耕農家庭，原名堯蕙，排行第五，字用五。岑溪雖是窮鄉僻壤，但地處西江上游，航運可通廣州，風氣不算閉塞。他中學畢業後不久，受了國民黨宣傳的影響，在五四運動那年隻身遠闖廣州，考入免費的廣東高等師範，自此脫離農村，成爲現代知識份子，這是他生命中第一個轉捩點。二十年代廣州是革命中心，孫中山先生經常到“高師”演講，父親深受感染，畢業後與同學成立“知用學社”，開辦“知用中學”，隨後更加入國民黨，投身革命事業，這是他生命中第二個轉捩點。在1925-27年間，他先後在粵省黨部、中央黨部和農民部任職，1927年初在武漢以國民黨代表身份，與毛澤東、周以栗組成三人常務委員會，共同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又在鄧演達、譚平山、毛澤東、鮑羅廷等人組成的土地改革委員會中擔任記錄；其後見證了當年夏天的“分共”，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第一個高潮，但轉瞬就過去了。由於受到1927年底廣州事變的牽累，他在1928年遠赴歐洲遊歷，隨後到香港定居，任《南華日報》總編輯，又曾在1932年赴南京擔任僑務委員會教育處處長，數月後返港。這些經歷頗爲曲折，可惜有關日記在1937年撤離南京時散失，只能夠從晚年的回憶文章得知一二了。

1935年父親進入行政院擔任參事，其後在這崗位上工作了整整13年，歷經七七事變、遷都、重慶大轟炸、艱苦抗戰、還都南京等變遷。1948年初他當選立法委員，積極參加政治活動；該年年底國民政府已是風雨飄搖，他臨危受命，出任立法院秘書長，迎來政治生涯第二個短暫高潮。翌年4月國府再度撤離南京，遷往廣州，他在10月初辭去秘書長職務，結束四分之一世紀政治生涯，到香港定居，其時剛好年逾知命，這是他生命中第三個轉捩點。香港是舊游之地，

有不少親朋戚友，故舊相知。其初他有意利用這些關係做小本生意，融入社會，可是頭腦和氣質都不相宜，不到幾年就虧輸蝕本，只好重拾本行，回到中學擔任教職。自此春風化雨，淡泊明志，度過平靜自得的二十六年教學生涯，但行有餘力，仍亟亟以國事為念，除編輯《自由人》半週刊之外，還撰寫不少政論和回憶文章，迄1986年以八十八高齡辭世。以上是他生平輪廓，具體細節見本書年表。

我在抗戰之初出生於重慶，當時物資匱乏，日機肆虐，大事轟炸，父母撫育提攜的艱困可想而知。但記憶中父親在週末從重慶市內回到龍井灣家中，卻總顯得那麼輕鬆、詼諧、自得。他腹中有無窮的《三國》、《水滸》和公冶長故事為我講述，手上會造出奇妙的彈弓、水槍、泥人種種玩意令我入迷，在山林間散步時又會撮唇模仿各種鳥類叫聲，如此種種，都為我的荒山童年打破枯燥沉悶，帶來驚喜、歡樂與陽光。抗戰勝利後我們一家人回到南京，其後短暫兩年間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件事情：首先，是在父親帶領下遊覽中山陵、靈谷寺，到玄武湖划船，蕩到荷花深處採摘蓮蓬剝吃；其次，是他買回來的大量兒童讀物，和姊姊的娓娓講述，其中有百聽不厭的《苦兒流浪記》、《格列佛遊記》、《愛的教育》，也有始終不得要領的《愛麗絲漫遊奇境》、《錶》和馬克吐溫《頑童流浪記》；最後，則是消息一天壞似一天，街上紛亂緊張起來，雙眉緊蹙的父親日益繁忙，以至姐夫帶我坐船離開南京奔赴桂林，那是一九四八年底的事情。

將近一年之後，我們一家人分批到了香港，跟著在港島南端的赤柱找到住所安頓下來。那是一排為漁民建造的小屋其中一間，狹隘簡陋，但面臨大海，環境清幽，有朝暉夕照之勝，當時不啻世外桃源了。不幾年，父親重拾教鞭，日子清苦而規律，但公餘仍然寫文章，辦刊物，議論時政，朋儕往還，不減書生意氣豪情。我雖然在學校寄

宿，週末跟隨他遠足、游泳、拜訪朋友、出席婚喪宴聚，春秋麗日參加知用學社郊遊，寒暑假在他督促下學習古文和英語，也還儘多親炙機會。父親生性淳厚，按中國傳統士人的習慣，孩子長大後，就不苟言笑，沉默相對，心中的歡愉或者不快，都不輕易流露。他對我教誨不多，然而影響非常巨大，可以說是貫穿、籠罩我的一生。我對於國家民族懷有感情，以及立身處世自有宗旨，不因環境時勢而改變，都應當是由於他的潛移默化，特別是他那樸拙倔強氣質薰陶所致吧。

日後我有幸到美國留學，但畢業後和大部份同學不同，未嘗逗留一日就返回香港擔任教職。這從發展事業的角度看來固然不很明智，就個人志向而言，則理所當然，此後近二十年間能夠與父母共聚天倫，承歡膝下，誠可謂人生莫大幸福。在此期間，中國大陸發生了令人振奮的翻天覆地變化，因此從 1973 年開始，我就多次回大陸訪問、講學，參加會議以及其他活動。父親對此不置可否，但很顯然，北望神州，他對往事仍然耿耿於懷，無法釋然，因此始終不為我的婉轉勸說所動，不願重臨故土。事實上，自 1949 年來港之後，除了 1952 年短暫的印尼之旅以外，他就寧靜度日，頤養天年，再也沒有離開這海隅小島一步了。父親一生並無赫赫功勳和名聲，但高風亮節，去就分明，無愧為時代洪流中有為有守之士。在他身上，我們可以見到中國歷史上萬千讀書人的操守與抱負，感覺到中國文化傳統（包括五四傳統）力量的偉大。這套日記記錄了他生命中燃燒得最旺盛的一段，展示了他一生堅持不渝的精神和信念，它的出版無疑是我所能夠獻給父親的最佳紀念了。

本書得以出版，首先要衷心感謝本所下列諸位同事：所務室的嚴桂香、邱玉明和李潔兒女士，特別是李女士以極大耐心和一絲不苟精神將日記全文錄入電腦，又花費大量功夫幫助編纂人名索引；以及鄭

會欣博士，他通讀本書全稿，指出許多錯漏，又惠然代為撰寫多條人物註釋。南京國家第二歷史檔案館、台北和新店國家歷史檔案館、台北國民黨黨史館等機構為我查閱克文先生的資料提供方便，台北黨史館惠允本書影印刊出兩通毛澤東致陳克文的珍貴函件，俱在此表示深切謝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慷慨同意出版本書，是這套日記得以公諸於世的主要原因，我謹在此對近史所、黃克武所長和張力副所長致以最誠摯謝忱。張力教授對本書的編纂、出版、以及某些圖版版權的洽商等細節費神甚多，余英時兄對本書的出版自始即不斷鼓勵，又不憚繁忙惠賜序言，俱盛情可感，在此拜謝。最後，我對本書的出版一度頗為猶豫，內人林雅尚和外甥梁其姿的支持最終令我能夠下決心進行，是此書得以面世另一個重要原因，也應當在此說明並誌謝。



2011年冬日於廬